

“超低”车补为公车改革开了好头

■晏扬

时事聚焦

中央国家机关公车改革方案7月16日正式出台:取消副部级以下领导干部用车;取消一般公务用车;普通公务用车社会化,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;司局级每月补贴1300元、处级800元、科级及以下500元;中央国家机关今年完成公车改革。

从1994年中央两办下发公车管理文件算起,我国公车改革已历经20年。在此期间,虽有一些地方试点公车改革,但总体上雷声大、雨点小且争议不断,而大多数地方则处于观望状态。

去年11月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下发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,其中明确提出取消一般公务用

车,推进社会化、市场化公务用车制度,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。该《条例》的出台,在我国公车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——公车改革不再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,而是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;不再是零敲碎打,而是“全国一盘棋”。现在中央国家机关推行公车改革,并明确改革完成时间表,就是对《条例》的具体贯彻和落实。

中央国家机关公车改革方案的最大亮点,大家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,那就是“超低”的车补标准。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,以近年来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杭州车改和温州车改为例,最高车补标准分别为每月2600元、3100元。更不要说西安经发集团的车改,最高车补达每月5300元;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曾经的车改,最高车补标准达每年8万元。相比之下,中央国家机关的车补标准堪称

“超低”,甚至远远低于人们的心理预期,说这是一份“惊喜”恐怕不过分。

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之后,发放公务交通补贴的正当性毋庸置疑,但车补标准必须“适度”,够用即可,切不可将车补异化为变相福利。此前一些地方的车改之所以遭到舆论炮轰,主要问题就在于车补标准偏高、畸高,明显是动机不良的“伪改革”,是以公车改革之名谋取福利,乃至将公车改革变成一场“权力自肥”的盛宴。这样的所谓“车改”,我们当然不要。

在这个意义上,中央国家机关“超低”的车补标准,为公车改革带了一个好头、树立了一个标杆,也足以让一些地方畸高的车补“自惭形秽”。车补标准是否规范合理,是公车改革成败的关键,也是改革能否赢得民众支持的关键,而车补标准高与低,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公车

改革的诚意和决心——公车改革的目的是遏制“车轮上的腐败”,而绝不是将“不落腰包的腐败”变成“落入腰包的腐败”,中央国家机关“超低”的车补标准,就是对公车改革宗旨的最好诠释。

上行需要下效。按照此次出台的《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,地方党政机关要在2015年底之前完成车改;用两到三年时间,完成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的车改。地方的车补标准,不得高于中央车补标准的130%;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边远地区的车补标准,不得高于中央车补标准的150%。这些“指导意见”意味着,公车改革已经有了明确的路线图、时间表和规范化的车补标准,接下来就该各地、各单位不折不扣照章执行了。

(来源:新华每日电讯)

言论观点

人民日报:
政治生态靠什么涵养

风气总是此消彼长,混日子、讲假话、钻空子的人多了,想干事、敢说话、守规矩的人就会被挤压。只有加大惩戒力度,才能防止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。同时,“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,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”。最关键之处在于,要让各个因子与生态系统之间,形成互相促进、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。

光明日报:
“治裸”是在重塑为官资格

“裸官”并非贪官的同义词,但不少“裸官”身在曹营心在汉,又确实是出现贪腐行为的高危群体。治理“裸官”映照出“为官”生态的深刻变革,说白了是由“官员”到“公职人员”的转变,是由“用好权力”向“管住权力”的转变

解放日报:
认准梦想,人人都可以是赢家

人生如此多姿多彩,在不同经纬上编织的梦想本就不存在高低输赢之分。创业致富、探索发明、名动天下、救死扶伤、教书育人等是梦想,成家立业、养儿育女、含饴弄孙,平凡人生何尝不也是一种梦想?在为梦想而奋斗的人生旅途上,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赢家。

医科分数重拾“霸气”后

■顾泳

近日,沪上高校第一批投档分数线“出炉”,两大医学院校分数线相当抢眼: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高达497分,上海交大医学院也达472分,均遥遥领先于理科一本线;在浙江地区,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分数线更是仅次于清华、北大。早前有报道,医学院录取分数线持续走低,为本不乐观的医疗环境“雪上加霜”;而今,医学院校亮出“高分”,大有“提振士气”、改变不利现状之势。

有专家分析,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为例,自去年起,复旦将医学院分代码“独立”招生后,连续两年分数“坚挺”,可见致力于救死扶伤的学子不在少数。也有人认为,由于就业形势不容乐观,“学医技术,走遍天下都不怕”的传统思维,影响了家长帮孩子选专业的方向;此外,物质生活丰富了,不再囿于赚钱谋生,追求高尚情怀,做有意义的事,没准也左右了“90后”的选择。

“面对如此优秀的学弟学妹,我们要拿出怎样的教育和环境,对得起他们的初心,对得起家长的信任……”分数线刚亮出,已在医生圈引起不小反响。从优秀医学生到优秀医生,漫长蜕变过程,需要不断更新知识、塑造医者情操,更需要呵护“初心”的向上环境。这显然并非教育部门一方可以完成。职业尊严、医患关系、社会地位……诸如此类的“附加值”,要怎样成为医生职业的吸引点,而不是消耗积极性的“利器”?这需要各方共同思考并拿出举措。

培养德技兼备的良医,攸关百姓福祉。让“读医科、当医生”的荣耀尽快回归,分数线重拾“霸气”,只是第一步。

(来源:解放日报)

“新闻反转剧”背后的浮躁

■曹林

近来舆论空间中出现了一种新现象,叫“反转新闻”。面对一条新闻,舆论都把矛头指向了某一方,可剧情突然发生逆转,舆论的态度也立刻随新闻“剧情”的逆转而转向。

比如近来厦大校长被本校一副教授炮轰“食堂要特权”:教工食堂在饭点常常无好菜可吃,而校长出现时服务员马上端出丰盛菜肴。因为是教师批评校长,而且批评的是舆论深恶痛绝的官本位和行政化,舆论一开始条件反射般站到了教师那一边。可正如前段时间的“走席医生”一样,从开始曝光行业潜规则的斗士,迅速变成以正义之名挟私绑架单位的“坏员工”,舆论迅速发生了反转——校长指责举报不实,称那位副教授被举报学术不端正在接受调查,于是,不少人又迅速将本来指向校长的矛头指向了那位副教授。

类似的“新闻反转剧”很多。发生一起交通事故,路人违反交通规则闯红灯被车撞死,网友就会骂路人,批评不守规则的“中国式过马路”,可如果媒体报道那辆撞人的车是宝马车,舆情可能立刻反转,都去骂开宝马车的人。还有,医院发生了患者打护士事件,因为公众的偏见,常会站在患者那一边,认为患者相对医生是弱者,舆论反而会同情患者。可如果媒体告诉你那个患者是个官员,舆情便可能立刻反过来同情护士了。

看来是“标签”决定态度。人们的情绪很容易被变换的标签牵着鼻子走,而没有去探究事实和非。一些误导舆论者,都善于借助标签去操纵舆论。知道公众同情弱者,就贴上一个弱者的标签,公众就很容易不去

问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,而条件反射般站在“弱者”这一边了。想让舆论同情一个人,就给他贴上小贩、低保人群、农民工、下岗工人、乡村教师之类标签,或者贴上曝光官员遭打击、举报贪腐等符号;想让舆论恨一个人,就给他贴上富人的孩子、官员的后代、开宝马的、开奥迪的标签。

这样的情形很多其实是违反新闻规律的。实际上,很多新闻刚发生时,真相并不会一下子全部呈现,需要媒体不断挖掘和官方的调查。从一开始不清楚到最后真相大白,这是自然规律。可新闻反转往往并非如此,不是事实的自然逐渐呈现,而是标签的变换。因为很多人浮躁,不看事实和是非,只根据事件当事人的身份去站队。可在新闻中,身份是很容易发生变化的,因为一个人有多重身份,是患者,也可能是官员,假如只根据身份去看,态度很容易发生变化。

网络传播之所以热衷于贴标签,是因为这方便读者偷懒。事实很复杂,一些人不愿意深入细致地探究,贴标签的行为可以代替复杂的思考过程。所以,在缺乏独立思考精神的舆论场里,标签传播会被很多人采用。它简单,直接,不需要真正动脑。

斯泰宾在《有效思维》中说,在复杂、多有变化的事情面前,人们在简单、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,感觉到了把握形势的力量。久而久之,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,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。这就是罐头思维。标签,其实也是一个罐头,它免除了一些人的思考,却在简化和扭曲事实中误导了受众。(来源:中国青年报)



天天“向上”

每到学校招生季,“天价学区房”会揪起每个家长的神经。北京30多万元一平的“宇宙中心”学区房余温未了,宁夏银川市的一些房产被划入名校片区后也坐上了涨价的“火箭”。

有统计称,原本未划在学区内的二手房,由于新补充进入学区,价格涨幅甚至超过20%,这一涨等于将学生家长好几年的血汗钱“折了进去”。

“天价学区房”在给低迷的房地产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的同时,也给教育公平一记响亮的耳光。(来源:新华社 王栋梁)

教务处长们的摄像头照出什么

■张国

最近采访某高校教务处长,发现一件怪事:其办公室的醒目位置安有一个摄像头,问起用途,令人吃惊。

时下正是大学的毕业季。高校每年都有相当比例的学生拿不到学位,原因是成绩不佳、挂科过多,或是考试作弊、触犯校规等等。教务处是校方审核学士学位资格的最后一道关卡。据这位处长介绍,每到此时,登门的不速之客太多,涉事学生本人来软磨硬泡,家长也托着各种关系,希望学校高抬贵手。甚至还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,为了孩子学业的问题,进门就把自己的证件拍到桌子上,令人啼笑皆非。

这位教务处长苦笑:“我现在风险

非常大。”在办公室安装摄像头,是他无奈之下采取的防护之举。学生和家长们进门后,双方交流之前,他会打开摄像头和录音设备。万一有人想给他塞点儿“土特产”或是撒泼闹事,他可以提醒对方——打住,我这儿有摄像头,人家24小时监控着我呢。

受访的教务处长很是委屈。他不敢给说情者开先例,只要开一个口子,学府的尊严就会一败涂地。而为了守住底线,他顶住了很多压力,得罪了不少人。

这位教务处长遭遇并非个案,很多高校都面临类似的问题。违纪或学业报警的学生,之所以再三到教务处长求情,是由于缺乏基本的规则意

识,抱着侥幸心理,认定是教务处而不是自己的不良表现“卡”住了自己。那些带着“土特产”或恐吓或找各种关系的家长们,即使姿态做得再谦卑,“一切为了孩子”的苦心再令人同情,骨子里也没把校规放在眼里。

有一次全国两会上,几位大学校长聊起此类现象,大倒苦水。武汉音乐学院院长彭志敏自称“被起诉的明星”——学生因个人原因自杀,或考试舞弊被开除,家属会来闹事。出事后,学校按照规定第一时间向上级领导汇报,而上级有时就一句话,要求息事宁人——你们要注意稳定,处理好啊。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也“年年当被告”。他举了一个例子:

该校拒绝向一名作弊的学生授予学位,被告到法院,几经周折。要想避免麻烦,学校可以直接发个学位,可从长远来看,这将深刻地伤及道德和学风。

高等学府里的风气连着社会的风向。医院里的“医闹”,学校里的“校闹”,本质都是社会病症的变种。世风不改,很难要求高校独善其身。一位高校教务处长说,摄像头的取景框终究是有限的,只能“守”住那几平方米的办公室而已。它只是社会防线上一个小而脆弱的单元。这个小小的摄像头照到和照不到的种种社会图景,才是真正令人深思和忧虑的。(来源:中国青年报)